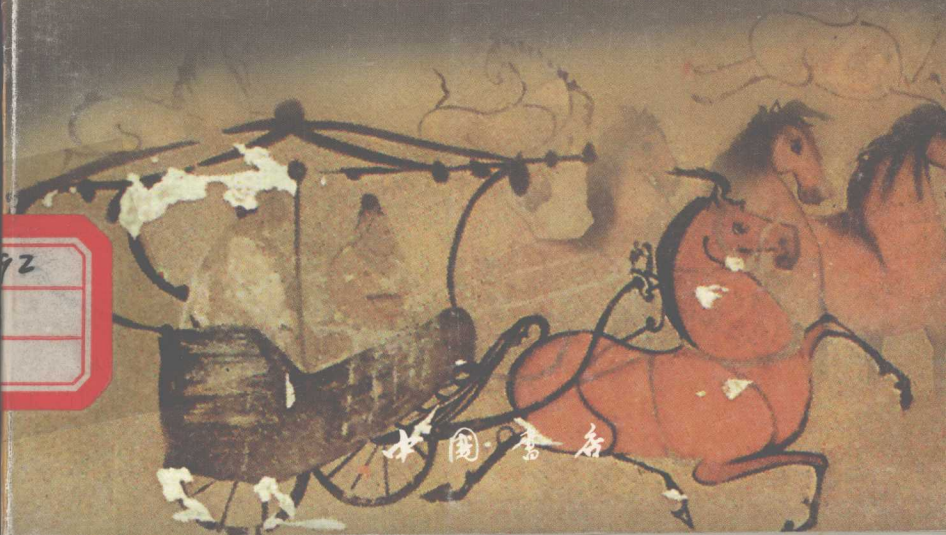


先  
秦  
诸  
子  
今  
译  
丛  
书

白话今译

# 孙 臆 兵 法

荣挺进  
李丹译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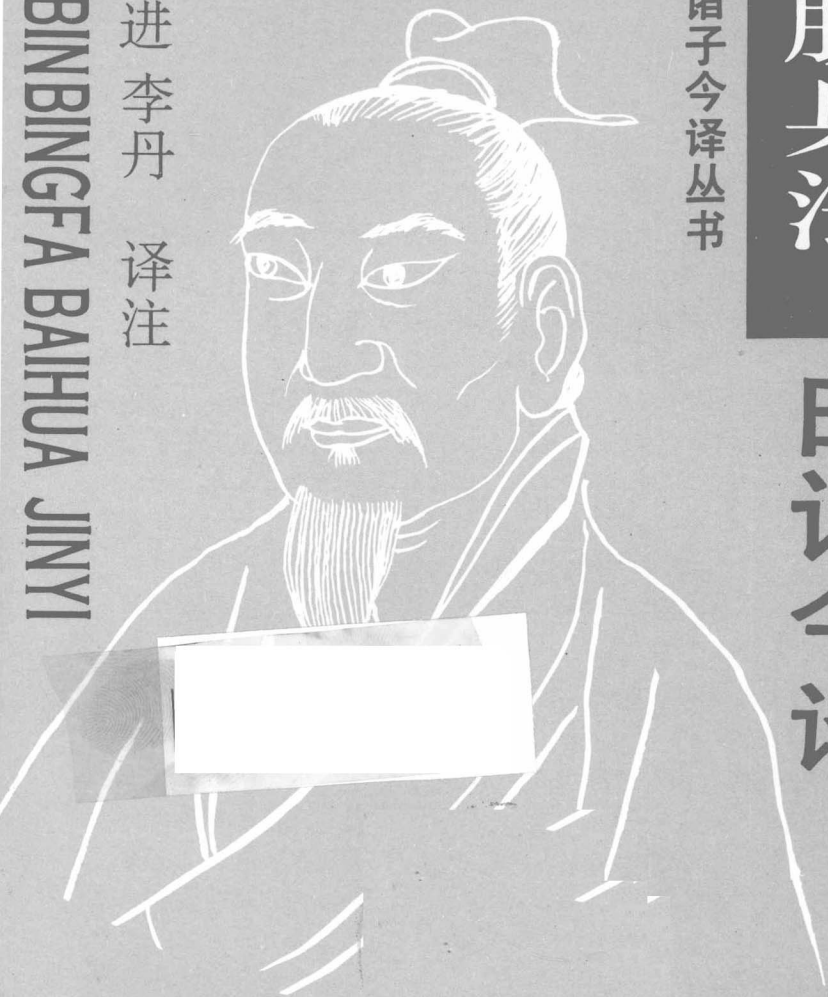
# 孙臆兵法

## 白话今译

先秦诸子今译丛书

荣挺进 李丹 译注

SUNBINBINGFA BAIHUA JINYI



中国书店

(京)新登字 213 号

本丛书顾问：启 功 郭预衡

责任编辑：东方少

《孙膑兵法》白话今译  
荣挺进 李 丹 译注

\*  
中国书店 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安新县印刷厂印刷

\*  
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375

1994年9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

字数：113千字 印数：10 001—15 000

ISBN 7-80568-566-5/E·4

---

定价：6.50元

## 序

这套“先秦诸子今译”丛书，从时间上看，正赶上由《资治通鉴》白话本出版而激起的古文今译热潮。既是“潮”，那就该归为“显学”，这个名称总是不大入耳的。而且，在有的人看来，将典雅古奥的国粹糟塌成浅俗不堪的白话，无异于挖掘祖坟，粗鄙无道。只是这潮仍不可阻遏地热起来了，起码说，还有许多读者喜爱这种“下里巴人”的东西。我常想，既然老祖宗的东西各个时代都有人注，而且注得好的都成了大师，拿不大准的就多多益善地收罗先人的话充数，号称什么经“注我”，甚至自己不“注”一字，尽得风流，达到了“大美不言”的化境，不但免遭物议，反为同行相与乐道。那么，今天我们译成大白话，不妨也可以冒充成一种注罢。当然，大潮一起，免不了泛些泥沙残渣，恰如这套丛书免不了多有注译上的错讹一样，但潮落之后，大浪淘沙，或者会有精妙之作显露出来。

先秦诸子的时代，在我国历史上是读书人人格相对独立，思想最活跃、少束缚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异彩纷呈、硕果累累、最为辉煌璀璨的时代。可以说，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。组成我们民族文化核心的儒、道、释三大思想宝库，就有两家半（因为佛教也中国化了）兴起于先秦。可惜自那以后，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重现过同样令人激动和向往的“百家争鸣”的自由壮观的局面。先有暴君秦始皇因惧惮

思想的伟力而“坑儒”，继以汉武帝为了“役心”的需要，采纳最长于给同类致命一击的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百家终究只尚一家，儒家变成了儒教。更可怕的是其后近两千年，儒教与封建政体结合，形成政教合一的形态，大大方便了统治者“动口”不行就“动手”，思想“教育”不奏效就施虐于肉体。于是，创造被扼杀了，“万马齐喑”成为不争之实。今天，欣逢大力提倡“思想再解放一点”的盛世，我们着手先秦诸子白话今译的工作，也是奢望以绵薄（精神的东西毕竟不如物质的来得直捷快当，此之谓“绵”；学养太浅，无能传其精髓达其要义，此之谓“薄”）之力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祖国曾有过的光辉时代，让更多的人歆享我们祖先创造的精神文明，让更多的人汲取菁华、走出蒙昧，为中华的复兴增添一分力量！

一个时期，反传统文化成为时尚。有的人动辄对传统文化大加挞伐，仿佛民国初闹革命，以为只要“咔嚓”一声将辫子剪掉，耳濡目染、浸淫五腑的封建污秽也随之而去。类似的“战斗”，从来没有成功过。“五四”时力倡“打倒孔家店”，现在不但没倒，香火还甚于从前。还有人辩护说那样做是为了“矫枉过正”，这不禁使人回忆起物质生产一“过正”就诞生“大跃进”的教训，我想精神文化的建设也不会例外。当然，我们并不认为“传统”就是十全十美的（持此谬论者也大有人在）。只是，既然“传”诸后代而成为“统”，那就有它的合理性和它的生命力。传统文化固然与具体的时代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是它在规定政治，还是政治常常要利用它，但是，传统文化绝不等同于它们，它是更趋于永恒的东西（如果不是伪文化）。一个时代结束了，一种

具体的政治体制被更进步的取代了，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传统  
文化精神可以增添新鲜血液，可以芟除与生俱来或在时间长  
河中衍生的赘物，但绝对无法结束它和取代它！退后一步说  
吧，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挾伐所结出的果子，一定也与来不及  
了解对象就歌颂同样苦涩。这，也是我们译注先秦诸子的一个  
原因。

这套丛书，承蒙著名学者启功、郭预衡两位老先生的关  
心，我们深感荣幸。北师大中文系郭英德先生和北京图书馆  
吴龙辉博士对本丛书的组织编译做了大量工作，没有他们的  
努力，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。丛书最后由我审定，由  
于学力不逮，时间紧迫，加之译注者水平不一，错漏之处在  
所难免。可以说，这套丛书如果还有可取之处，应该归功于  
学界前辈的指导和学养我只能望其项背的诸位先生的辛勤劳  
动；而它的所有不足，则应归咎于我的才疏学浅，力不胜任。

《先秦诸子今译丛书》主编 李 双

1992年8月21日于北京

## 导 言

孙臆，一般认为是战国中期齐国人，也有说法称“孙臆楚人，为齐臣”（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篇高诱注）。其生卒年史籍无载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告诉了后人他的家世渊源：“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，”孙武是著名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，本田齐王室宗族，如果据此判断，也可以说孙臆其人“系出名门”。《通鉴·周纪》综合各家史书，把孙臆生平基本浓缩如下：“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，庞涓仕魏为将军，自以能不及孙臆，乃召之。至，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，欲使终身废弃。齐使者至魏，孙臆以刑徒阴见，说齐使者，齐使者窃载与之齐。田忌善而客待之，进于威王，威王问兵法，遂以为师。威王谋救赵，欲以孙臆为将，臆辞以刑余之人不可，乃以田忌为将，而孙子为师，居辎车中，坐为计谋。”据说，孙臆其名为“臆”就因“以法断其两足”的臆刑而获致的。说不定后来如诸葛孔明那般羽扇在手，端居辎车的儒将风范，也是孙臆这“刑余之人”形象的引申。司马迁《史记》还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孙臆助田忌赛马赢威王，齐魏争强斩庞涓的历史故事，它们构成古籍里孙臆的基本生平材料。

依据上述材料，我们可以大致清理一下孙臆的主要事迹。他活跃在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间，即战国中期齐威王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“亚圣”孟子兴致勃勃在游说梁惠

王，商鞅正研究着现实，踌躇满志要在秦孝公手下大搞改革。诸侯各国此时还未明显分出高下，正各擅其能，各逞其强，“各领风骚三五年”，整个中原一片扰攘。齐国内部，邹忌已经讽谏过齐王，齐威王本人正肃立纪纲，明定赏罚，要大干快上振兴一番自己的国家，重温数百年前齐桓公威霸中原的旧梦。

孙臆和庞涓犹如一对相生相克的孪生物，他们一起登上历史舞台。二人“俱学兵法”，后世有人附会了一位颇有仙风道骨的鬼谷子先生作他们的教师，还有人干脆把《孙子兵法》“指定”成了二人的军事教材。庞涓率先出山，“得为惠王将军”，本想引荐一把同门师兄弟，但终于在孙臆如约而至之后“欲使其终身废弃”。这一事件给孙臆以极大刺激，他从魏国偷偷地搭便车逃去齐国，投在齐将军田忌门下，替田忌在赛马场上出了个“点子”：“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，取君上驷与彼中驷，取君中驷与彼下驷”，显露出才智吸引了齐威王的注意，成为齐威王最主要的军事顾问。在齐魏间的桂陵、马陵两次战役里，两次实施围魏救赵、围魏救韩的策略，大败魏军，并终于斩杀了庞涓，——其时用心之狠：“斫大树白而书之曰：‘庞涓死于此树之下。’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期曰‘暮见火举而俱发’。”（两段引文皆取自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）他要叫庞涓万箭穿心而亡！但庞涓一死，孙臆似乎也就完成了使命，他们一死一活但一起走下了历史舞台。

而马陵之役的影响却是不小的。一些中国战争史的研究者认为，马陵之战，虽为魏国与齐国之战，却是秦国与中原相争的历史转折点。魏国本中原强国，为阻挡强秦进击中原



的强大屏障，此役一毕，“不仅将晋国数十年来之霸业摧毁净尽，而对秦之东方关隘已破，虎兕出柙，中原之势突变，历史乃转为另一时代。自此以后，三晋无复再有掩护中原之力，中原诸侯遂日以防秦之入侵为事，纷纷扰扰历一百二十余年，而卒皆被并于秦，追原祸始，马陵之战实有以启之。”（见台湾三军大学编著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《中国历代战争史》第二册，1980年修订再版本116-120页）因此，从中国的统一大计说，孙臆以其军事才能，为这一段历史的演进，无意地贡献了一点促成的力量。

但史籍所载孙臆的行迹，仅此而止了。他最后的归宿，只有民间故事和传奇有一点补充。山东《莒州志·古迹》记载：“莒县东南百里甲子山前麓有孙臆洞。”直至1955年大破“四旧”时，此洞中一直供奉着一尊骑牛臆脚的孙臆坐像，和二侍立童子像。或许当年孙臆先生激流勇退，隐居到这片林幽潭清的野处去终其天年了吧？他如历史书里许多人一样，因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出现，也随历史事件的结束嘎然失踪，只留下一个名字和几件事迹，供后人借去撰拟各样的传说。如果说他还有较之更多历史人物稍显幸运之处，就是他的《孙臆兵法》终于流传至今，让人对他始终难以忘怀了。

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即指出，孙臆死后，“世传其兵法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对此也有记录：“《吴孙子》八十二篇，图九卷；《齐孙子》八十九篇，图四卷。”《吴孙子》即孙武的兵法书，孙武以兵法献给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庐，因此仕于吴，和伍子胥一起大干过一番事业，这《吴孙子》大概是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的别一种版本。《齐孙子》一书，一般认为即是孙臆传世的兵书，其数既有八十九篇之

多，且有插图，很可以说是一部大书了。

但在唐人编撰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里，《齐孙子》一书不见了著录。自唐至清至近代，这部书一直湮没不载。史书里只有几个字，几句话的记录开始遭到要“拿证据来”的学者们的怀疑，诸如孙臆是否确有其人，《齐孙子》和《吴孙子》是否为同一部书之类的问题咄咄逼人地提出来。孙武及其《孙子兵法》凿凿有据地存在于各朝各代，每朝每代也分别有好之者投入地研究它。而孙臆其人其书渐于近代已几乎被认为子虚乌有了。

1972年四月，山东临沂市银雀山基建工地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，专家们从这座确定年代为汉武帝时期（前140年—前87年）的古墓里清理出残乱竹简四千九百多枚，其简文书写内容，多为论政论兵的材料，其中有与通行至今的版本略有差异的《晏子春秋》等，还有部分至今未见著录的其他杂著。尤为引人注目的，是简文里写有“孙子曰”开篇的一组竹简，经对照，它们中有现存十三篇《孙子兵法》的文字，可以确定无疑归属于孙武兵法。另一部分“孙子曰”的简文间却记写着“孙子见威王曰”和“禽庞涓”等字样，这显然不是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能做的事情，它们正与《史记》所载孙臆为齐威王当军事顾问和孙庞斗智诸事相合。这一部分“孙子曰”的文字，不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《吴孙子》八十二篇的佚文，而是失传已千余年，几乎让人忘却了它的存在的《齐孙子》的内容。整理出来的《孙臆兵法》虽然并不就是《齐孙子》或说孙臆兵书的原貌，但孙臆的思想终于实际地呈露在了人们面前。

《孙臆兵法》是一部兵书，它首先引人注意的就是军事

思想。和先秦兵家著作一样，《孙臆兵法》首先探讨的就是战争的性质和作用，《见威王》一篇较为充分地展示出孙臆的战争观，他以上古三代帝王非战不治的雄辩事实表明了战争的必然：“德不若五帝，而能不及三王，知（智）不若周公，曰：我将欲责仁义，式礼乐，垂衣常，以禁争诤。此尧舜非弗欲也，不可得，故举兵绳之。”他没有如孟子荀卿之流从理论上去深入考究人性的“善恶”，但他清醒地看到，单纯的“责仁义，式礼乐，垂衣常”理想在历史和现实里是空幻和渺茫的，欲治天下，必得“举兵绳之”。要“战胜而强立”，方得天下服。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和社会，非战不足以立命，正如“陷齿戴角，前蚤后锯”的动物，喜而合，怒而斗，乃“天之道也，不可止也”（《势备》）。由此必然性，孙臆表达他对于战争性质和作用的看法：为“强立”而战；而“战胜”与“战不胜”的后果是严重的：“战胜，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，战不胜，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”，他把战争的胜负直接和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，曰：“兵者不可不察。”但是，正如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兹《战争论》所说那样：“战争是手段，其目的是为政治的意图”，孙臆把用兵视为“先王之传道”的工具，他坚信，战争要“有义”才能“固而强”，战争要为“义”而战：“夫乐兵者亡，而利胜者辱。兵非所乐也，而胜非所利也。”（《见威王》），他引述了成语“素信者昌，立义用兵”（《威王问》）来表达了他对于“兵”的最终看法。

在战略战术方面，孙臆的主张和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，一方面他们声称要“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”（《孙子兵法·虚实》），“必攻不守，兵之急者也”（本书《威王问》篇），一再重申攻敌的原则：“出其不意，攻其不

备”，他们强调的是战则必胜，要一举成功。这是一种积极进攻的战略思想。在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强调“知己知彼”“料敌计险，必察远近”，要有“先知胜不胜”的前提，这又是一种稳健的、踏实的战术主张。“见胜而战，弗见而诤”（《八阵》），今天，人们都已熟悉的“战略上藐视敌人，战术上重视敌人”的军事原则，正似从这里脱胎出来的。而孙臆“缭敌计险，必察远近”（《威王问》）的思想，把孙子“知己知彼”指导原则落实和具体化了。“知道者，上知天之道，下知地之理，内得其民之心，外知敌之情；阵则知八阵之经”（《八阵》）。上知天文星相，下察地理形势远近，对内来说，民心固不可失，还要知道“篡卒”“延气”，军队的组织职能及将士的训练等等（见《官一》《五教法》二篇），这是“知己”的一面。就“知彼”一面来说，孙臆的“缭敌”（又作“料敌”）所要求的敌情分析，不仅包括对敌方军力、装备及动向等情况的掌握，他还深入到对敌人作战心态的揣摸和把握，从而利用之打败之。在《擒庞涓》篇里，我们看到孙臆一再给庞涓布置下“迷魂阵”：“吾将示之疑”“吾将示之不智事”，以此，他逐渐激发起庞涓的怒气，并终于把握魏军既贵既武的心态，利用他们的骄纵一举击溃了这股强敌。读《孙臆兵法》一书，我们一再看到“诱之”“引之”一类的策略，即是他这一面思想的展现。

源于这样的战略思想，孙臆十分讲究“阵”“势”“权”“变”的灵活，尤其在古代战争中地位十分突出的“阵”法讲究上，他下了极切实的功夫，并总结了丰富的实战经验，“用八阵战者，因地之利，用八阵之宜。用阵三分，每阵有锋，每锋有后，皆待令而动。斗一守二，以一侵敌，以二收。敌弱以

乱，先其选卒以乘之；敌强以治，先其下卒以诱之。……”（《八阵》）与古代其他谈论阵法的书籍相比，这里没有一点虚玄的色彩。他把用兵的各个方面内容凝聚到一个核心上，就是要创造有利于己，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，“居生击死”。如果说《孙子兵法》还只是侧重于“兵因敌而制胜”这一方面，到了孙臆这里，他已把这种“制胜”之势扩展到因地（“计险”），因天（“月战”）和因人三方面，创造有利的形势和战机击败敌人。《地葆》里的地理分析，《月战》的天象之说，《纂卒》及其他数篇一再提到的精选士兵（“纂卒力士”），战而有锋等，包括《陈忌问垒》篇里的凭空造势，都围绕着战阵这个中心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，去取得战争的胜利。

读过孙臆此书的读者，都不会忽视其“贵人”的思想。“间于天地之间，莫贵于人”（《月战》），作为一个优秀的将领，孙臆充分意识到一支具有最强战斗力的军队之重要性，他从君、将、士三个层面和训练、使用两个角度论述了一支优秀的战斗队伍的标准。“矢，卒也。弩，将也。发者，主也”（《兵情》），孙臆打了一个极好的比方，把一支军队的构成和发挥作用比作“弩矢”：卒须“前重而后轻”，如此方能“犀而善走”；将须“弩张正”，“送矢壹”，不能“偏强偏弱而不和”；而主则如“发者是”。最重要的是，必须这三者协调一致，方能“中昭”，胜敌。因而，从君的层面来说，不可“御将”，须以“德行”“信”“义”取信于将，取信于士，取信于民，“兵之胜”，“其利在于信，其德在于道，其富在于亟归，其强在于休民”，而“其伤在于数战”（《纂卒》），“德行者，兵之厚积也。…恶战者，兵之王器也。取众者，胜之胜者也”。由将的层面说，他上须“忠”于王，“得主制制”，下必

“信”于民，“得众”，于个人来讲，则要“知道”，通晓用兵之道，“量敌计险”一类，并且气质上要能“敢”——“敢去不善”；否则，“不忠于王，不敢用其兵；不信于赏，百生弗德；不敢去不善，百生弗畏。”（《纂卒》）那就永远只有打败仗了。而优秀的士兵，须对他们进行各方面的训练和教育、培养，有“处国之教”“行行之教”“处军之教”“处阵之教”，甚至还有“教耳”“教足”“明目”的“利战之教”。在进行这些战术技能训练的同时，也要把如“孝”“弟”“良”这样的“五德”熏陶进去，如果没有后一方面的思想品德素质，“虽能射不登车”（《五教法》）！在使用军队的时候，“纂卒力士”就是作战的胜利保证，冲坚毁锐，覆营斩将，以及各种阵法作战之“锋”，全由这些精锐之兵去充任。

自然，孙膑这里的“贵人”并不是我们今天讲究人的个性这类对于人的精神，人的主体性本身的重视，他的“贵人”只是在国家和军队这个大机器里对于人的使用的重视。因而在《行纂》里，孙膑又极为坦然地谈论到如何利用“夫民有不足于寿，而有余于货者，有不足于货，而有余于寿者”的心理，分别投其所好，使之“死者不毒，夺者不温（愠）”的能力。正象《将德》篇所写，对于士兵们要“爱之若孩童，敬之若严师”，更须“用之若土藎”！

“道”是一个广泛出现于先秦旧籍的概念。在古代兵书里，《孙子兵法》把“道”列为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五事之首，对之解说得相当明白：“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民弗诡也。”（《计篇》）这一“道”，显然近于儒学正统的“仁道”之道。孙膑的“道”之概念，与之迥异，他几乎对于用兵的每一个环节和方面都用“道”去解说

了，“用兵移民之道”（《行篡》）“兵之道”（《兵情》）“天之道”“地之道”（《势备》《地葆》）还有什么“将之道”“安国之道”（《威王问》）等等。如果对之进行一番整理，可以把它理为大致两类：“知之道”和“用之道”。“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”（《陈忌问垒》附简）“知道者，上知天之道，下知地之理，内得其民之心，外知敌之情，阵则知八阵之经”（《八阵》）这里的“知道”之“道”显然指事物的内在规律，其内容由“天”的自然规律和“地”的自然规律，以及民心敌情用阵等人的规律，也即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三方面构成。它较之孙武子的“道”的概念宽泛而确实。“不知道，不胜”，“知道，胜”，“兵之胜……其德在于道”（《篡卒》）“知其道者，兵有功，主有名”（《兵情》）等概念，均属此类。孙臆军事思想里的“兵之道”，就是上述内容的综合，即是说把握和协调运用社会和自然的内在规律，正象《奇正》篇所说的那样：“以万物之胜胜万物，故其胜不屈”。但“用道”之“道”则是另一种涵义了，它指掌握上述内部规律之后，在具体情况下所决定的作战策略，即运用的技巧。《威王问》篇里齐威王列举战场上的各种战况，然后请教孙臆“用之奈何？”“有道乎？”这“有道”就是指的是否有什么可用的（行之有效的）最佳作战方案。孙臆在给威王田忌上完军事课之后叹息他们“几知兵矣，而未达于道”，实际上正是表明，齐王田忌之流所关注的仅仅是“用”之道，而未深及应“知”之道，未真正把握用兵的根本价值。

就在孙臆的叹息声里，我们发现，孙臆的军事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的理想。《吕氏春秋·慎势》篇写道：“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阳

生贵己，孙臆贵势”，在这里，《吕览》并未把孙臆列入论兵之类，而在论政之属。汉刘歆《七略·兵书略》把古之兵书划为四类：兵权谋、兵形势、兵阴阳、兵技巧。很明显，孙臆之学当属在兵形势之列。虽然《孙臆兵法》也时见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星相之说的痕迹（如，《月战》的“以星胜”“以日胜”“以月胜”等，《地葆》篇“五壤之胜”），在具体战术运用上也不排斥灵活多变的技巧和权谋，但是，孙臆思想在骨子里是始终关注治理国家、推行道义的“大道”的。这一点和《管子》一书的情形很相似，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管子，（这里姑且把那部“组装货”归之管子门下）无论用兵还是讲“道”他无不纳之入治理整顿强盛国家这个政治目的，孙臆虽然没有《管子》那样一种大系统的骨架，但这种倾向却是极分明的，这大概也是他和《孙子兵法》重权谋不一致的地方。正缘于此，孙臆对于普通兵家极为关注的“赏罚”，“权势谋诈”等问题，只持一种“可以益胜，非其急也”（《威王问》）的淡漠态度。他把“富国”视为“强兵”的关键（《强兵》），“兵数困，不明于国胜兵胜者也”（《兵失》）。这些思想从今天的世界形势看，也是卓有眼光的。也正是从这种意识出发，他对于“用兵”的意义是冷静的清醒的，“夫兵者，非士恒势也”，“夫乐兵者亡，而利胜者辱，兵非所乐也，胜非所利也”（《见威王》），进而，用兵打仗本身也并不就是完全必要的：“恶战者，兵之王器也”（《篡卒》），他把孙武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用兵上策，发展成一种厌恶用兵、消除战争的理想——尽管这理想，如前所述，他极清楚其虚幻、渺茫，——这种理想色彩，已萌动着接近现代社会的和平、安定主题。英国战略家李德·哈特在《孙子兵法》英译本序言中



说：“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，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之后，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《孙子》这本书了，”因为《孙子兵法》“使我认识到深邃的军事思想是不朽的”，此话移来评论《孙臆兵法》亦不为过。孙臆并不反对战争，这世界需要战争，但战争不要为争权夺利而进行，而要为消除邪恶直至战争本身而进行，这样的意识已远远超出军事理论的范围了。《孙臆兵法》最终不是一部军事技术指导书，而是一部有深邃思想价值的著作，正由于此，它对于今天的“用兵者”们也是一剂清醒剂。

现在，“商场如战场”，从日本人那里开始，卷起一种把兵书当商战指南来读的热潮，这也是有其必然性的。中国古代兵书里所表达的战略战术思想，事实上也是中国古人在一种高度竞争的状态里磨砺出来的生存智慧，这种智慧由于它必须研究敌对双方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地理、天文、人情人性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，照顾每一场战争全局各方面、各阶段之关系，从而作出对战争全局的统一而有效的筹划及指导，这正与现代商业社会的生存竞争情况下，人们必须进行全局思考和综合策划的意识相通。它们都排斥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僵硬死板的思考方式。因此，商场和战场所需要的“谋略”，甚至官场所需要的“权谋”，它们作为一种“机敏绝窍”的活动，都能在中国古代兵书的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里获得启发，它们“已被证实对于人类及人类心理有很深的洞察”（台北包光贤编《孙子兵法应用于今日商场战无不胜！》），因此有一部分人视之为“外交教科书”，有人把它们奉为在广阔的人类社会谋求卓越生存的指针。《孙臆兵法》作为古代兵书中相当优秀的一本，其实用或涵养的价值都是